

“国不自立万事已矣”

——30年代《再生》对日观*

王 毅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北京 100005)

摘要:《再生》是张君勱、张东荪等人于1932年5月在北平创办的国社党机关刊物。关于中日问题,30年代的《再生》指出了腐败的国民党政府是导致中国受日侵略的原因,批判了政府的外交政策,主张改革内治准备抗战,即将中国改建为一个近世的民族国家。

关键词:《再生》;国民党;国联;近世的民族国家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0)02-0041-07

作者简介:王 毅(1982-),女,贵州遵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博士研究生。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东荪等人于1932年4月在北平秘密成立国家社会党,同时宣布成立“再生社”,次月发行《再生》杂志,张君勱任主编,其主要撰稿人有张君勱、张东荪、胡石青、诸青来、牟宗三、梁实秋等国社党成员或与国社党关系密切者。30年代,《再生》与《独立评论》一起构成了自由知识分子的主要话语阵地:前者代表了张君勱等组党派自由知识分子的言论,后者为胡适等不党派自由知识分子提供了话语空间。^{[1](P278-279)}对《独立评论》对日观考察成果颇丰,而鲜有人研究《再生》对日观。^①这种失衡不利于展现此时期自由知识分子对日认知的全貌,不可不谓一大缺失。鉴于此,笔者不揣冒昧,试图通过研究30年代《再生》^②的对日观来发现此时期该杂志言论的特色,并检视这种对日言论的得失。

一、“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对国民党当局之批判

《再生》创刊号上发表了《我们所要说的话》,该文表明了其宗旨在于提出新方案“致中华民族于复生”,并将方案总则界定为:“以国家力量使民族有一体之自觉,社会尽协和之机能,个人得自由之发展;并对外取得平等地位,——改善国际关系,期达永久平和。”^[2]可见,《再生》认为应从内外两方面努力以实现民族复兴,其关注也应围绕国家内外问题展开。但据笔者统计,1932年至1937年间,《再生》共发表文章365篇(包括译著),直接与外交及国际问题相关的时评性文章仅22篇,不到全部文

* 收稿日期:2009-12-26

^① 以《再生》为题的研究可参见魏万磊的《民国思想史研究中的〈再生〉与“再生派”》(载《重庆社会科学》2008年第8期)及《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知识体系的批判性反思——以20世纪30年代〈再生〉为个案》(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② 本文以1932—1937年间的《再生》为考察对象,虽然此时期《再生》的出版形式存有差别,但总体观之,其论述都呈现出较高的同质性,并与1938年复刊后的《再生》表现出明显的不同。

章数量的10%。这代表了此时期《再生》的一个重要特色,即主要评估中国内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现状,并提出改革主张,而对外交及对日问题表现出一定的冷漠,这种倾向似乎与其所标榜的内外结合的救国总则有所偏离。

其实,这是《再生》有意为之的结果。《再生》看来,国家是一个有机体,内部机体尤其重要,外邪侵入因内部器官败坏而起,故“民族大受惩创之日,惟有痛自检点过失”^[3],中国过失是“有机体的瘫痪”与“中枢(指政府——笔者注)的失职”。^[4]具体观之,九一八事变开启了日本侵华战争,接着热河不出十日即告失守,这都是中国自身内治腐败造成的,“盖东北事变,自表面言之为外交,自里面言之,则内治也,书曰‘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唯我之自安于弱昧,自陷于乱亡,而后日人始取三省,继则一载又半年之间,见我之一无战守之备如故,而热河之战又起矣。孟子亦曰‘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家必自毁灭,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5]而内治腐朽根源则在政府当局,“那时的地方当局(东三省长官)和中央外交当局乃至最高当局真和吃醉了的人一样完全在沈(指“沉”——笔者注)睡之中,所以到了今天论起功罪来,送掉四省的责任不能不加在他们身上。”^[6]

“沉睡”二字似有夸大之嫌,因为南京政府对于日本侵华还是做出了一定的回应。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确立了依赖国联的政策,对日实行宁为玉碎的不交涉主义。榆关事件后,政府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到长城血战之时,政府则开始寻求对日交涉。张东荪指出,正是这种“不能战所以抵抗,不能和所以交涉”的对日方针给中国带来了被动局面。“和”必须要有诚意,愈早愈好,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是和的时机,晚些日本提出五项原则也是一个时机,再后来国联秘书长德拉孟出面调停又是一个机会。但中国政府都错过了这些时机,到平津危急之时寻求交涉是无济于事的,只能是“城下之盟”,结果必然是“屈服”的。^[6]如张东荪所说,《塘沽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从而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

“和”没诚意,“战”不坚定,不是全面地布署全民族抗战,而是作避免最小损失的“局部力量的抵御”,这是当时南京政府对日作战的一个特点。张东荪尖锐地指出这种小规模抵抗不足给日本以教训,反而危害甚大,反而引起日本的轻视,甚至会

惹得日本人愈骄横。^[6]除此,“局部力量的抵御”更是对抗战军力的一种戕害。中国并不乏义勇抗敌之士,但却因得不到政府支持而归于失败。1932年1月28日夜,日本侵略军由租界向闸北一带进攻,驻守上海的19路军奋起抵抗,开始了淞沪抗战。虽然十九路军坚持了一个多月,但最终仍走向了失败。胡石青较为详细剖析了十九路军失败的原因:前无援助,应敌人数太少,手上不得补充,临时补充也不足应敌;后方空虚,日军从热河登陆抄袭后路,所以前方只能退却。再加之当局在是否调遣东北军队以应敌的问题上举棋不定,错失良机,造成了失败。^[7]值政府在战和问题上举棋不定之际,马占山等人在关外组织东北义勇军坚持武装抗敌,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日本侵略势头。但是这些军队由于得不到关内军队的援助而处于被动的地位,《再生》对此充满了体恤之情,“他们奋斗,前有强敌,后无援助,交通机关不再自己掌握,彼此不能联络,可是他们竭力的抵抗,替地方人民吐一口气,此种抵抗为大牺牲的抵抗,所抵抗的对方,是组织十分完全,设备十分完密,器械极其利害的军队,每次冲突敌人死一个,我们总死十个,现在仍抵抗中,每天为奋斗为保存东省,少则十几个,几十个,多则几百个,天天在那里死,我们对他们牺牲,爱莫能助,无从为力,很是难过。”^[8]所以在政府消极抗战的基调前,关内与关外军队的抗日,除了自我牺牲外,最大的价值就只在于“为国民争人格,为政府壮声势,为敌人增隐忧耳”,“如责之以恢复失地,消灭伪国,驱逐敌虏,无知其必不能济也。”^[7]因此,要实现民族自救,必须要依靠政府调动人民抗战,单靠局部力量的反抗无济于事。

前线是十九路军、东北义勇军奋勇杀敌,国内的政府却忙于内战,一方面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对中共苏区发动围剿,一方面国民党内部各派、中央与地方及地方军阀之间也政争不断。对此,张君勱尖锐地批评政府,“国防可以不整顿;财政可以不整理;国民生计可以不促进;国民智识可以不发展;我有我之领土,我有终年闭户打架之权利,外人惟有袖手旁观,若先圣‘兼弱攻昧取乱侮亡’之言,在神圣的革命过程中,应失其效力焉者,孰知内乱为外力侵入之媒”^[9]张君勱的提醒不可不谓精准,内部分裂只能给日本侵华以可乘之机,政府当局应放下屠刀,结束内争,一致抗战。

让《再生》痛心的还有人民在战争面前只知“惊慌措乱和逃难”,但《再生》认为只可对人民感叹,

“而不可对他们责备”，因为人民长期受到内战的痛苦，对于外战与内战在知识上也不能区分，所以在情感上对外战也提不起兴趣，只是将外战与内战同等看待。“所以社会方面的漫无组织，而只知个人逃难，乃是历年来有以致之的”，^[4]根源则在国家平时不讲究发挥民众精神民众合作的办法^[8]，改变这一状况也只有赖诸政府的努力。

人民只知逃难已甚，不少人出卖国家为日效劳更是雪上加霜。日本策划天津便衣队暴乱，人民为几个铜板卖身为汉奸，全国上下在国难面前不知爱国反倒卖国，实为“全国道德的坠落”^[10]，但《再生》强调，这也是政府造成的，天天讲礼义廉耻开展新生活运动的政府官员自己也无道德可言，而导致人民流离失所，“吃饭穿衣且无着落何能择之以讲道德”？观之日本与欧美等国，平日“彼人民受国家之教养，以国势之不竞为大耻，又安有在外患期中为敌人之虎伥者哉？”再察之中国定县，大兴教育，四月之内人民识得四千余字，正是这不多的启蒙使人民思想发生了改变，积极收听广播关注战况，踊跃为十九路军募捐，并“尝举行抗日运动”，六千名乡民积极参加。^[5]所以，中国人民并不是不能教化的，政府应“以识字开智为第一义”^[5]，对人民教之养之，培养人民爱国心。

另外，全国之破碎、号令之不行、指挥之不一、军械之不良、交通之不讲、军纪之废弛、军队之杂滥及将帅之下流等，^[5]这些都是中国政府不事建设之结果，导致了中国在战争中的败绩。所以，当前中国“只有一个立国问题，而没有所谓抗日问题。自己不能立国，则一切都谈不到。自己若能立国，则收复失地不过在实践的迟早而已。”^[11]

二、“内无治外无以交人”：对国际援助之体认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一方面对日妥协退让，一方面诉诸国联，企图依靠国联来解决中日问题。《再生》极力反对这种依赖国际力量解决问题的思路，^[7]因为“国与国之竞争，视乎内治之修明。强大之海陆军力，与国民经济力相表里，国之无力者，虽有外交上之智巧而无所用之。”^[9]南京政府诉诸国联只是站在本国立场上“卑词乞怜”，“决不能买得国际之同情。倘吾能奋发有为，造成一远东新形势，则各国各为其利害计，转不能不诸事皆与吾商，而国际大问题之解决，乃不能不有利于我。”挽救民族危机不能靠外交辞令获得，中国“必

先有以振作人心，团结全国；平素为政敌之党，亦必邀与合作。我今祸患已深，虽难一举而有所救济，然要当首谋举国一致，方可有所决策。必使人人皆负责任，人人皆知利害，人人皆有贡献，成为全国之动员，共同努力，才乃外交之前提”^[12]。实力政治下，弱国需要的不是外援，而是国家自立与强大，有了实力后盾，才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

实力的大小决定了国际地位的高低与外交政策之实效。吊诡的是，越是实力弱小的国家就越易向国际舞台上寻求援助，正所谓，国弱，更需要外交。^[13]正是因为没有实力支持，所以只能寻求外部力量给予支持。近代中国半世纪以来，中国表现出来的都是没有立国的决心，在急难之前，从李鸿章到唐绍仪都是乞援外邦，中国内政也为外人所操控，“名为与外国订盟，实令他人代庖，名为以外国顾问为过渡，久而久之，则安之若素矣。”^[14]南京国民政府对日问题上也如此。在这种依赖心理下，人们容易养成厚责外国而薄责本国的倾向。关于日本侵华的原因，当时国内就存在三种从外部因素探寻原因的做法，即日本帝国主义说、英法祖日说及国联责任说，对此，《再生》指出“以上三种理由，于对外宣传之际，加日本英法与国联以责备之词，因无不可，若专归各于他人而视己若无责焉者，则于立国之理，偏其反矣。抑不仅厚责本国而薄责外国已焉，即就本国言之，应轻外在之原因而重内在之原因”，^[5]“自外交手段以评东北问题，皮相之见也；自外交手段以谋今后危局之挽救，皮相之见之尤者也。”^[9]

在此判断引导下，《再生》并不将解决中日问题之希望寄托于国联等国际势力身上，而是站在一个更为客观理智立场评判国联行动。九一八事变后，国联理事会屡次要求日本撤兵未果情况下，便组成调查团前往中国调查，并发表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时人对于国联活动表示极大的关注，《独立评论》、《大公报》等对报告书的结论作出了种种猜测。相比之下，《再生》对此的讨论就显得冷清得多，只有胡石青发表的《“九一八”之回顾与展望》对此有所涉及。胡石青认为，当今国际三大势力——即国联、美国与俄国各具立场并乏共同之利害，所以“相互牵掣，莫敢先发；故皆消极的反对日本之暴行，并不能积极的提出制裁之方法”，所以报告书“决非拥护去岁九月三十日及十月二十二日之原案，令日本将军对撤入附属地内，令中国接收失地同时负护日侨之责也”，其结果与日方所希望的“在中国宗主权

下承认满洲广漠之自治权”只是语气上轻重之别，中国从过去一年中国际变化应该得到重大教训，即“吾人如不自寻出路而希望国联，希望美国，希望苏联，皆为自绝之道”。^[7]

果真如胡石青所料，报告书与国人恢复事变前状态的愿望相去甚远，国内各界大部分人对报告书进行了谴责与批判。在国内舆情高涨情势下，《再生》对国联及报告书直接评价的言论并不多，而是通过检视种种批判意见表明了自己的看法。汪精卫发表《告别国人书》，认为报告书的事实叙述及东北事件因果观察，“皆明白公允”，谴责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政策。但是调查团的建议却与其自述事实不相符合，指责国联虽有公平观察和正义的同情心，但其制裁力明显不足。^[15]张君勱指出，国联的种种规定已经为自己的裁制不力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国联认为满洲问题并非一国侵犯一国边界的案件，而认为满洲处于中国领土之外，国联也没有代中国收回满洲之责任，即便报告书第十六条有断绝经济关系的规定，但由于满洲并非保证之领土，所以也不生效。张君勱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国联的实质是：“躲却责任，知有强权而不知有公理者何如乎”，因此汪精卫希望国联加大裁制力度的愿望是达不到的。^[14]面对西南当局对国联“舍所谓该案全部之理论，而顾及非法造成之局势”的指责，^{[16](P1)}张君勱就认为制裁只能适用于国内法庭，不能适用于国际，“吾国人责国联以恢复原状，而国联曰请君好自为之。不知西南当局将何辞以对。”这表明了《再生》认知不同于时人的一面，它清楚地认识到《报告书》乃“一篇和事老之文，各方自皆有所不满，以曲归之日本，而无所以矫正之者，以直归之吾国，而有无所以保障之者，盖国联之性质，本为政治上之调停机关，而非评判曲直之法庭也”，既无军事裁制实力又无经济封锁勇气的国联并不能采取实际行动，所以《再生》也并未像诸多时人那样将解决中日问题的希望寄予国联身上，而是进一步指责了中国一味依赖国联的错误，尖锐地指出国联只知对强国委曲求全，于弱国玩弄之至，其实不值得信赖。^[14]

希望之于虚妄，正与失望相同。当时人纠结并悲愤于报告书结论之时，没有奢望国联“说好话”的《再生》却能更冷静地对待国联。虽然认为“国联只有几条决议案，而没有丝毫实力的援助”^[17]，但《再生》仍坚持中国应摆出诚意尊重国联，国内舆论界“一回儿主张倚靠国联，又一回儿骂国联无用”都是

错误的；批评这些批判都过于专注于细节，认为中国处于今天的田地，叫外国人说好话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既承认国联这一条路是比较上可以走的，则一方面应该竭力痛下忏悔，力图自强，而他方面应当在可能范围内仍可接受国际的合作。到了今天，存亡已在呼吸之间而仍想以言论来争，在小处剖白，实在是无用了。”^[18]尽管报告书结论不尽如人意，但《再生》要求国人要遵守外交法则，不要因为国联的不公而使既定的外交方针摇摆，国际交往的基础正是国家的自强，这反映了《再生》深刻的政治眼界。

《再生》的判断是正确的，1933年2月24日，国联召开特别大会，通过了十九国委员会的报告书。报告书内容主要来源于李顿报告书，否定了日本所成立的伪满洲国的合法性，在道义上支持了中国，但是同年3月27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退出国联，脱离了国联“束缚”的日本放开手脚加大了对中国的蚕食。显然，南京政府幻想依靠国联来制衡日本，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国际势力与日本的利益博弈决定了他们既勾结又对抗的矛盾关系，对中国的援助“只有空言而无实际”。所以尽管中国政府的大国外交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与俄复交”、国联技术合作、中德关系发展良好，但是这些都没有阻止日本侵华的脚步，“中国之存亡，中华民族之存亡，已等在下一大次大战来解决。”^[10]

三、“他山之石，可资攻错”：建立一个近世的民族国家

国民党政府诸多内治问题给抗日带来的重重困难，外部势力也不能给予实质性的援助，那么只有在内治上内部入手励精图治，才能积累实力以抗日。虽然报告书实等于废纸一张，但张君勱读出了《报告书》之于中国的警示，提醒国人“走上了国联的路子并不是指我们静候国联来救我们”，要求国人多开展自省与悔过，“在他方面”以图自强。“他方面”即是内治整顿。张君勱同意报告书关于中国并不具备国格的判断，并认为，“调查团之所以指摘我之过失，真他山之石，可资攻错也”，中国必须把自己治理好，才能成有从事外交之“国际形体”。所以，中国要接受报告书的关于中国国格的判断，并努力从内部着手，致力于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近世民族国家。^[14]希祖也认为，对日虽是对外问题，却关乎内政，“倘使内政没有妥帖，这就无从谈起了。因此我们的最小限度希望不是主张应有准备。乃

只是希望先把准备的前提弄好了。”^[19]总之,当今国难的情况下,“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在于造成一个具有近代式机能的民族国家”^[20]。

《再生》看来,建立一个近世的民族国家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必须从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在其纲领性文件——《我们所要说的话》中,记者列出了九十八条具体的建设纲领,主要是,实行“修正的民主政治”,建设“国家社会主义”,变放任教育为“有计划的教育”,保持思想之自由、学术之独立。30年代中期以前的《再生》就围绕着这一纲领展开阐释与论述,对日建言,则仅仅从批判内政与国民党政府外交方针入手。

1935年1月中旬,日军首先制造了“察东事件”,其“不仅是客星分割,直想全部据为己有”的野心明白表于国人面前。6月,日本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了《秦土协定》与《何梅协定》,中国丧失了河北和察哈尔省的大部分主权。11月,日本扶植汉奸引汝耕在河北通县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冀东22个县脱离中央,整个华北岌岌可危。在此形势下,1936年7月,国社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宣言,主张立即抗日。接着张君勱着手翻译德国名将鲁屯道夫的《全体性战争》,并改名为《全民族战争》,于次年1月出版发行。形势的变化影响了《再生》的论述风格,与前期着力于批判内政与建构阐释纲领不同,后期的《再生》直接“论战”的文章增多起来。1937年起,《再生》相继发表了张君勱的《战争之全体性》、《鲁屯道夫小传》、《再论现代战争之全体性》、《对外抗战问题》、李文湘的《部分的侵略》、赵正平的《如何坚强我全民族战争中之精神力》(转载)等文,每期新设的《编者后记》都对战争问题进行讨论。《再生》呼吁道,“时至今日,我们国民应该有一个中心思想,这就是‘对外抗战问题’”^[21],抗战之心跃然纸上。

虽然体认到抗战一触即发,但《再生》在论述中仍保持相当的冷静。对于时人激愤的抗战主张,《再生》指责他们“大抵愤敌人之凌侮,乃不惜拼一切以争之”^[22],停留于激愤的口号与宣传对于抗战是不够的。张君勱通过考察一战中的德国,“深有感于现代战争之繁重,非平日筹划周详,则一旦开战,时陷国家于紊乱,而莫知所止之境。”战争需要军事动员、人民支持、财政后盾、技术保障等,只有“好谋而成”,从政治、军事、财政、经济、技术五方面振作才能支持日久之战争。^[22]简言之,现代战争是全体性的,是以本土的民族精神力与物质力为根据

的战争,^[23]中国当务之急是从政治上确立政制,消灭党治;在经济上建立统一、独立、现代化的经济体系,从教育上培养民族的精神力,等等。虽然关于备战的论述较为散乱,但我们仍可读出《再生》为自己“致中华民族之复生”的纲领张本的意图。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在危如累卵的形势下,《再生》仍秉持冷静的品质,在对战争长期性与艰巨性体认的基础上,主张从内治上为全体性战争做准备。但深重的民族危机下,《再生》的论调还是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出现了一些鼓动性的宣传。《再生》编者曾指出,一个原始经济的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也未始不可集中心力与敌国一拼,“野蛮足以破坏科学,足以使科学无用武之地。……工业经济的战争体系不能耀武于原始经济战争的体系。……我们的大刀体系可以与日本的科学体系相抗至一月之久。”所以“仗仍然是可以打的,我们并不套以大刀而泄气。但这是至不得已时的就事论事而言。”^[24]“不得已”一词道出了《再生》的无可奈何。在民族危机深重的30年代,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依赖理性与秩序的知识分子都不得不暂时放下自己的建言去宣扬抗战。

四、简单的评析

《再生》是30年代张君勱等人演说阵地,与胡适等人创办的《独立评论》,一起为我们展示了自由知识分子救国言论的图景。“自由”是两派知识分子所努力追求的,其中言论自由是其共同的重点。言论自由涵义有两重,一是向外,要求有一个允许发出不同声音的环境与保障,一是对于自身的,即是能坚持独立的思考,不依傍他人的意见,不囿于世俗的成见与观点,在自己知识积累的基础上,理性地去思考与处理问题,这为《独立评论》所标榜。^①《再生》论说也透露出了自己坚持自由的精神——“仅仅一种杂志,本谈不到什么救国,什么收复失地;但不敢苟同,不敢随声附和的精神,我们虽不敢自夸,也可以说国家前途的一线光明。”^[25]综观两刊,《独立评论》的对日观尽管表现出与时人不同的闪光点,但却出现了与当局靠拢、随着国民党

^① 《独立评论》在其创刊号上的相当于宗旨的《引言》中特别声明“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参加:《引言》,《独立评论》第1号,1932年5月22日。

政府政策变化而变化的倾向,其标榜的“不依傍任何党派”精神似乎有所折扣。^[26]与《独立评论》不同,《再生》对日观建构在对国民党政府批判的基础上,无论是内治还是外交方面,《再生》的批判都是到位与客观的。《再生》也因此遭遇焚刊、禁刊等与共产主义书刊相同的“待遇”,其主要作者也因此几经打压,但他们表现出的独立气节与自由精神,恐怕比胡适派知识分子更胜一筹,所坚持的底线比他们更为透彻。

自由主义居于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之间,它反对对旧有秩序留恋的保守,但同时也反对革命等全盘推翻现状的激进手段,它致力于“构建理想社会,批评现实制度,似乎永远不满足现状”^{[27](P249)},批判与建构是自由主义的两个重要面相。《再生》始终站在一种批判的立场上对政府的作为进行了尖锐的指责,主张中国从内治入手解决所民族问题,并系统地提出了改造内治的方案,这正是自由主义上述品质的表征。《再生》的这种思路获得了读者的认同,一名读者来信道:“政治刊物的兴趣表明民众兴趣的转移,但不是失之于偏激便是失之于空洞无物,还有就是站在片碎的立场上,能拿出具体方案和通盘计划的惟有再生”。^[28]这种赞誉亦算公允,因为当时舆论界的讨论常停留于发表评判的就事论事,少有能拿出系统方案以飨读者之读物,《再生》算是践行此理念的独树一帜之刊物。“颇受读者欢迎”的《再生》始终将人们的视线集中于国内问题上,引导人们冷静、理智地认识中国问题,并以其影响力对中国高涨的反日舆情可能带来的非理性的破坏力产生了一定的规约作用;其坚持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国民党政府,是促成政府走上抗战的重要舆论之一;其救国方案虽未得到践行,但许多思路为后来的实践所证明。

但是,在近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过于理性与冷静的品格似乎与救国的主题格格不入,更为致命的是,他们不能抓住实现民族独立的关键。胡适对民族主义有一段经典的论述:“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设一个民族的国家。因为最后一步是艰难的,所以一切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最容易先走上前面的两步。”^[29]胡适的话表明了民族主义的三个层次,从时间维度上说即是面向历史、当下与将来的态度与主张。民族主义与过去总是相连的,因为必须从历史中寻找因素建立一种民族的神话以提高人们的民族自觉与民族自信,胡适所

说的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即是一种最为普遍的途径;“现在”维度的民族主义即必须解决当下的民族问题,对中国而言,30年代最大的民族问题即是如何摆脱日本的侵略;而努力建立一个近世的民族国家则是在实现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后的发展目标,质言之,中国必须摆脱了外敌入侵,获致了发展的秩序,才能从事内治改造以建立一个近世国家,“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可见,《再生》对日主张可算作民族主义之“当下”层面的重要内容,并将实现内治改革、建立民族国家的努力视作解决当前民族危机的重要途径,其错误在于将“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混为一谈,没有认识到内治改革必须在“民族革命”完成后才能实现,甚至过于强调“社会革命”而轻视了当时中国所最急需的“民族革命”,没有认清“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区别。30年代的《再生》不应将论述重心置于改革方案建构上,应考虑如何使中华民族迅速走上全民族抗战的道路,这包括如何动员群众、实现民族团结、促成政府抗战等,而这些靠社会改造方案的宣传并不能实现,惟有获得一定的经济基础、权势力量与武装设备,并以此作为后备与南京政府对话,才能促成国民党抗战。虽然《再生》群体为实现政府改革与国家统一奔走相告,积极寻求机会与地方军阀联合,但是这些努力都归于失败,他们只有话语的能力,但却未掌握实际力量以践行其救国主张;《再生》反对泄愤式的主战主张,但是对主战派的评价似乎过于笼统,没有看到主战派内部之分歧,既有义愤式的高昂基调,也有合适的抗战激励。除此,还未看清主战派的救国心理,看到他们对民众抗战情绪的鼓动作用,看到他们军事上迎战准备之合理性;《再生》自省的精神值得肯定,如若因此轻视了军事准备与抗敌的作用,危害甚大;《再生》对大国及国联的实质有着清晰的认知,但是却并没有认识到可以在国际舞台上利用国家间利益的博弈展开斗争以制衡日本;对于民众的力量,《再生》有所认知并加以体恤,却找不到团结与动员的手段,而是将之寄托毫无前途的政府改革上;对于民众的排外意识,他们读出了其中的危害,对一盘散沙的民众在非理性情绪支配下可能变成“乌合之众”有所担忧,但是却不知道“灌输强烈而狂热的排外一是发动民族主义运动必不可少的思想准备”^{[30](P286)},没有认识到民众蕴涵的巨大力量,并积极主动引导民众,使之走上正确的轨道。这些都决定了《再生》主张实践效果的微弱,彰显了珍重秩序

与理性的自由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日益逼仄语境中的失语。

参考文献:

- [1] 邓丽兰. 域外观念与本土政制变迁—20世纪二三十年
代中国知识界的政制设计与参政[M]. 北京: 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 2003.
- [2] 记者. 我们所要说的话[J]. 再生, 第1卷第1期, 1932-
05-20.
- [3] 张君勱. 菲希德《对德意志国民演讲》摘要[J]. 再生, 第
1卷第3期, 1932-07-20.
- [4] 记者. 榆关事件的教训[J]. 再生, 第1卷第8期, 1932-
12-20.
- [5] 张君勱. 呜呼! 不成国家[J]. 再生, 第1卷第9期,
1933-01-20.
- [6] 东荪. 教训[J]. 再生, 第1卷第11期, 1933-03-20.
- [7] 胡石青. “九一八”之回顾与展望[J]. 再生, 第1卷5期,
1932-09-20.
- [8] 记者. 中外时事述略[J]. 再生, 第1卷第2期, 1932-
06-20.
- [9] 张君勱. 欧美派日本派之外交政策与吾族立国大计
[J]. 再生, 第2卷第1期, 1933-10-01.
- [10] 大 廖. 中华民国前途的大危机[J]. 再生, 第3卷第1
期, 1935-03-15.
- [11] 记者. 今年的九一八[J]. 再生, 第2卷第1期, 1933-
10-01.
- [12] 记者. 关于外交政治经济文化四项之主张[J]. 再生, 2
卷 11、12 合期, 1934-08-01.
- [13] 胡 适. 世界新形势与中国外交方针[J]. 独立评论,
第 78 号, 1933-11-26.
- [14] 张君勱. 国联调查团对于中华民国国格之判断[J]. 再
生, 第1卷第6期, 1932-10-20.
- [15] 中外批评[J]. 外交月报, 第1卷第5期, 1932-11.
- [16] 中国国民党湖南省报告委员会.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及
国内各方之论评(下编)[R]. 中国国民党湖南省报
告委员会, 1932.
- [17] 记者. 本志第三年之命运与使命[J]. 再生, 第3卷第1
期, 1935-03-15.
- [18] 燕客. 书评: 外交月报[J]. 再生, 第1卷第8期, 1932-
12-20.
- [19] 希 祖. 现政府应有最小限觉悟[J]. 再生, 第2卷第
11、12 合期, 1934-08-01.
- [20] 记者. 我们对于“救国”问题的态度[J]. 再生, 第2卷第
8期, 1934-05-01.
- [21] 立 斋. 对外抗战问题[J]. 再生, 第4卷第7期, 1935-
06-15.
- [22] 张君勱. 战争之全体性[J]. 再生, 第4卷第2期, 1937-
04-01.
- [23] 张君勱. 再论现代战争之全体性[J]. 再生, 第4卷第3
期, 1937-04-15.
- [24] 编者. 编者后记[J]. 再生, 第4卷第3期, 1937-04-15.
- [25] 记者. 本志第三年之命运与使命[J]. 再生, 第3卷第1
期, 1935-03-15.
- [26] 田海林, 马树华. 《独立评论》与抗日救亡[J]. 民国档
案, 2000(4).
- [27] 李 强. 自由主义[J].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7.
- [28] 安 平. 现在的问题[J]. 再生, 第1卷第3期, 1932-
07-20.
- [29] 胡适. 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J]. 独立评论, 第150号,
1935-05-12.
- [30] 唐文权. 觉醒与迷误[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
社, 1993.

(责任编辑: 陈 伟)

“No Nation, Nothing Exists”

——Rebirth's Stand on Japan in 1930s

WANG Yi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5, China)

Abstract: Rebirth is the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the National Socialist Party which started in Bingjing in May 1932 by Zhang Junli, Zhang Dongsun, etc. On the issue of Sino-Japan relationship, Rebirth in 1930s pointed out that the corruption of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had led to Japanese invasion, and criticized the diplomatic policy of the government. It advocated reformation and preparation for fighting back, that is to turn China into a modern nation-state.

Key words: Rebirth; Kuomintang; League of Nation; modern nation-state